

社会学—苏修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叶 伯乐

读完本期摘译的策夫·卡茨的《苏联的社会学》这篇文章，仿佛看到了社会学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在苏联大肆泛滥的一个轮廓。社会学是一个什么东西，通读全文，大致也可以了然。

社会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腐朽、反动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土壤上长出来的一株大毒草。它的使命就是妄图维系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意识到它是有用的工具，可以有助于”“使现存制度更加合法化和更加永恒”；取代马列主义的地位”因而拚命抓住社会学这根救命稻草，强化对苏联人民的法西斯专政，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无怪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要欢呼社会学在苏联“获得新生”，“成为最活跃的科研领域之一”，“水平不亚于其他国家”……。正当社会学在西方陷于破产境地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却把痼疽当作宝贝，其更加腐朽、更加反动的程度，也就可以想见了。

卡茨是西方的一位社会学家，他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看到苏修复辟社会学的若干情况。

首先，社会学在苏联，是公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精神贵族为了复辟社会学，一直鼓吹“世界上有很多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马列主义的科学原理不相适

应”。这就是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一九六六年，在苏联明斯克召开的所谓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的社会学学会会议上，正式打出反列宁主义的旗号，提出“列宁的阶级定义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证明，社会学是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卡尔·马克思》）苏修的社会学，尽管吸收了现代西方的整个概念结构，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谓“民意测验”、“书面征询”，但是一概不去揭露苏联存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存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严酷的现实，相反，倒是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现实，因此，它的伪科学性是十分显然的。

其次，社会学在苏联，完全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据卡茨说，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变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用‘社会的政治组织’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不仅仅是采用社会学的名词术语问题，而是反映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已被颠覆，法西斯专政猖狂肆虐的现实。这种社会学，“它不敢触及到权力机构和领导核心，这是不能碰的禁区”。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的共同特征，不过在苏联法西斯专政下尤其突出。对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那是社会学万万碰不得的，因为这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命根子。而“有利于统治集团方面的工作都搞得很活跃”；对党的政策制订者“发挥了微妙的深远的影响”。至于搞点所谓社会调查，装模作样地揭露一点不大不小的缺口、不痒不痛的矛盾，苏联社会学当然要干一点，但是本质上都是为了“有效控制社会”，修补苏联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机器。列宁在揭露米海洛夫斯基这个俄国社

会学家为沙皇政府效劳的罪恶时指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能够满足人类天性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奴役多数这种不合‘人类天性’的现象为基础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苏联社会学对于苏联‘少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奴役‘多数’苏联人民的事实，从根本上是讳莫如深的。这就难怪苏修叛徒集团要把社会学“当作有效控制社会的方法和使（法西斯）制度合法化的工具”了。

第三，社会学在苏联，已成为一小撮精神贵族“飞黄腾达的阶梯”因而更加无耻、更加堕落。卡茨说：今天，“苏联年轻的知识分子阶层对社会学特别感兴趣”，“这门新的有价值的科学”，“为新信徒们创造了飞黄腾达的机会”；许多青年人都把社会学看成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未来的高潮’。‘这是很自然的。社会学既然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是促使苏联社会总概念根本改变的一个主要因素’，‘在社会学影响下的苏联社会思想，已经变得更加诡辩和更加适应当前苏联的现实生活了’。社会学对苏修有这么大的‘功绩’，那些所谓社会学家当然会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的宠儿。其实，这些人只是一小撮，是苏联知识分子的右翼。“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物以类聚。这些人充当勃列日涅夫之流的马前卒，不但掀不起什么“未来的高潮”，只能炮制出一股混浊的逆流，到头来必然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的殉葬品。

社会学对我国并不陌生。旧中国不必说。自从一九五六年苏修派出代表出席国际社会学第三次会议以后，我国就有一些坚持复辟社会学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跳了出来，配合苏修复辟

社会学的逆流 叫嚷要用社会学“来丰富历史唯物论”妄图使社会学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这件事说明，“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正因为这样 批判苏修 批判社会学，同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也就有密切的关系了。

苏联的社会学

〔美〕策夫·卡茨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是美国研究苏联社会学的“权威”。他写过很多关于苏联社会学的文章。这是其中一篇的节译。

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为什么会在苏联“复活”？它主要介绍了苏修叛徒集团如何通过“学者”、“教授”在苏联推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简况。这是全文的引言。第二部分是，从阶级结构、社会分化、等级、教育、异化、青年问题、种族关系等几个方面对苏联现状进行了一些揭露和分析。第三部分是结论，它揭示了苏修叛徒集团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分析了社会学在苏联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由于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不可能透彻地说明苏联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发生的社会问题的实质。但是，文中所引用的苏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对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苏联社会的矛盾，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苏联，社会学长期被打入冷宫，近十五年来又逐渐获得了

新生，并已成为最活跃的科研领域之一。苏联经常派遣代表出席研究社会学的国际性会议。在方法论和概念论方面，特别是在运用高等数学和模式结构方面，苏联第一流学术中心的社会学家所达到的水平不亚于其他国家。

在西方，很少有文章论及这种有意义的变化。本文所要研究的是社会学在苏联为什么会获得新生？社会学研究哪些主要内容，结果怎样？最后，社会学发展对苏联社会可能会带来哪些变革等方面问题。

为什么社会学学会获得新生？

问题的主要答案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所经历的变化。斯大林的继承者依靠所谓科学方法，求助于社会学的探索，通过对社会结构、动机、行为等方面科学的调查分析，作为有效控制社会的方法和使制度合法化的工具。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有效工具才得以复活。

过去，长期来的隔绝政策，割断了苏联科学和世界科学发展的联系。这种政策的削弱，也是导致苏联社会学有所进展的一个原因。在斯大林逝世后几年，一个由老理论家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参加了一九五六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社会学大会。原来，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但在会上他们却发现不仅在西方，而且，某种程度上象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事实上也已存在了新的社会学。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自然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苏联学者如果不掌握它，就不能在这一领域内作出任何的贡献。因此社会学在苏联的发展，就更为迫切了。

还有一个不太愿意公开承认、但极为重要的原因。十月革命

胜利后半个或多个世纪以来，苏联的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新一代的高等院校的师生、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普遍认识到世界上有很多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马列主义的科学原理不相适应。从长远看，这些马列主义原理可能有效，但却不能用来研究当前社会的实际变化。他们认为西方搞的那一套社会调查的先进方法是不可缺少的。甚至说，在一个中央集权、全面计划化和工业化程度这样高的国家内，搞社会调查比西方的自由竞争国家更有必要。

今天，有科学头脑的苏联年轻知识分子阶层对社会学特别感兴趣。这门学科的研究课题对他们来说是新鲜有趣的东西，消除了过时的教条和陈词滥调。他们通过系统搜集资料，加工整理数据，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对有关的社会现象作出精确计算，从而对社会发展获得“客观”的分析。这门新的有价值的科学，不可能为苏联党的职业政治家和老一辈的“社会科学家”所掌握，这就为新信徒们创造了飞黄腾达的极好机会。

阶 级 结 构

在当前的苏联，社会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有领域它都涉及到了，但没有一个领域搞彻底，这是因为它受到限制、偏见和审查的关系。总的来说，它不敢触及到权力机构和领导核心，这是不能碰的禁区。在很多重要领域，如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动机、业余生活和工作效率、家庭生活、青年的志趣和问题、都市化问题、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以及宣传工具、科学的经营管理、宗教和文化等社会学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客观研究。总之，有利于统治集团方面的工作都搞得很活跃。

然而，苏联的社会学家还是冲破了不少的限制和禁忌，深入

到某些对马列主义学说关系重大的领域，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社会结构问题。人们都知道 苏联自称是“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早已消灭了’但尚未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苏联人认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决定阶级的重要因素。目前，既然存在着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以，在苏联社会就只有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庄员两个阶级。不参加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阶层”，它不依附于任何所有制，因而不能单独成为一个阶级，只能是成为为两个阶级服务的一个阶层。^①

尽管苏共拥有对列宁主义名言重新解释或修正的权利，但是，这个过分简单化的官方理论，却于一九六六年在明斯克召开的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学学会会议上遭到了批判。有些社会学家提出，列宁的阶级定义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还提出修改阶级结构官方理论的多种标准，建议取消迄今为止的某些公认的社会成分，或者相应调整某些阶级成分^②。从那次次会议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发言者总是首先说明列宁的观点，然后加上各种限制性的表述，实际上就使得原先赞同的观点难以站住脚，而不得不加以改变。

Ю·В·阿鲁纠尼安在他写的一篇关于苏联农村人口调查报告中所暴露的观点很能说明问题。他一开始就“接受”了阶级划分的官方公式 把国营农场农民划成“工人阶级”把集体农庄

^① И·А·斯捷潘连和 В·С·谢苗诺夫主编：《苏联的阶级、阶层和集团》，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版第一三六到一四三页。

关于明斯克会议讨论的情况，可以参阅一九六六年第五期《哲学问题》第一四三到一五四页；一九六六年第三期《哲学》第一三三到一三八页；斯捷潘连和谢苗诺夫主编上引书，以及他们主编的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一书。

庄员单独划分为完全不同的“集体农民阶级”。继而根据他的调查材料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在工资待遇、劳动态度、工作条件和文化程度等等方面，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机械操作工之间的差别很小，而机械操作工和两种所有制中的田间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却非常大。可是，在官方理论指导下，却把农场的机械操作工划为工人阶级，而把农庄的机械操作工划为农民。^①

另一个苏联专家 О·Н·阿尔捷罗维奇，也对当前根据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划分阶级的原则是否仍有效，提出了同样的挑战。他认为阶级差别的消失，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两种所有制的差别消失。接着他说：“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次要的，并不是第一位决定性的特征……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并不总是事先决定不同阶级的出现。”^②

被苏联划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使以往官方划分阶级的理论成为过时了。二十年代知识分子阶层在苏联在职人员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一九五九年它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点五，工人占百分之四十八，集体农民占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五。一九六八年它又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五以上，工人的比重维持在百分之四十八点二五，集体农民则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五。目前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已达三千万，和一千八百万集体农民相比，它的比数是二十八比十七。一个苏联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将超过工人阶级的人

阿鲁纠尼安：《农村人口的阶级划分》转引自《当前苏维埃报刊文摘》纽约，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

② 斯捷潘连和谢苗诺夫主编：《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结构变化的若干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

数。^①

很明显，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官方的教义，特别是和社会主义社会通常把工人阶级看成是领导力量这一说法越来越自相矛盾了。有些苏联社会学家试图‘保留’工人阶级的地位，不致于被知识分子阶层所超过，并且使原有的教义能和现实状况相一致，曾提出：工厂的所有技术专家，与其说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倒不如说他们是体力劳动者；与其说他们是知识分子，还不如把他们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可是，有些人反对；还有些人则坚决主张目前按职业划分的结构较之阶级结构更加重要了。^②

社 会 分 化

苏联最近的社会学调查，不仅对既定的阶级结构，而且对官方认为苏联的阶级差别正在逐步缩小、并已大踏步走向单一的无阶级社会的论点，都提出了疑问。和官方论点相反，社会学家的调查结果揭示了苏联在各个社会集团方面不仅有差异并经常存在着集团利益的矛盾。因而，社会变成更加多样化并且阶级分化正在日益加深。^③

Φ·А·阿拉卜-奥格勒主编：《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进步》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八到十页。

② М·Н·鲁德基维奇：《关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层的概念》一九六六年第四期苏联《哲学》双月刊第二到二十二页，以及斯捷潘连和谢苗诺夫主编：《苏联的阶级、阶层和集团》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第一三六到一四三页。

③ 鲁德基维奇前引书以及他写的《知识分子增长的社会根源》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第九期美国《当前苏维埃报刊文摘》；《六十年代苏联社会结构的数量变化》原刊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版的《社会主义差别》第三期第五到十九页；О·И·什卡拉洛：《苏联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转引自一九六八年第十二期美国《当前苏维埃报刊文摘》。

承认拥有各自特殊利益的社会集团的存在，并且它们既互相发生矛盾，也和整个社会“共同利益”发生矛盾。这就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由于正统的马列主义原理认为：工人阶级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因而不存在任何利害冲突。这就导致苏联理论家们对既定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有趣的补充解释。例如 С. С. 维什涅夫斯基于一九六七年写道：“人民的普遍利益和阶级利益是一个复杂的辩证关系。承认人民的普遍利益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客观上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的普遍利益是和阶级利益完全相同的，或者说阶级利益必须从属于人民的普遍利益。”^①

其他如 Г. Ф. 拉维尔契夫为了摆脱困境，争辩说：“非基本阶级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利益，可能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利益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除去工人阶级利益是和整个社会一致外，还存在着许多阶级、集团……集体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矛盾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它的起因决不能只归之于资本主义残余。”^②

这些发展表明：在社会学影响下的苏联社会思想，已经变得更加诡辩和更加适应当前苏联的现实生活了。现在还很难看到这种新观点是怎样论述一个复杂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和不同利害关系的集团，是怎样跟苏联官方所宣称的正在稳步走向无阶级社会能完全一致起来，它们又怎样和官方所想象的“苏联人民在思想上、政治上一致”的言论相吻合。然而，经过莫明其

① 《科学的社会管理》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第一八三到一八八页。

И. Л. 马林柯主编：《关于社会主义管理的科学原则》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第一三〇到一三二页，第一六九页。В. 阿法萨谢夫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二八四页。

妙的特殊的辩证加工，苏共党内理论家很快就抓住了苏联社会内仍然存在着利害关系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的论点，从而为党的统治找到了新的辩护。因而，象拉维尔契夫，就把社会主义发展的这种新特点看成是“政治调节制度”存在的理由，并说：“科学的政治思想体系（马列主义）同政治组织（党和国家）一道，才能保证全体人民利益永远置于首位。”

等 级 和 教 育

官方宣称苏联社会阶层不存在等级制度的差别，在城市产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之间假如仍然存在着什么“差距”，或者这两种集团和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如果仍然存在着什么“差距”，那末，这也是很快就会克服的。但是，同这种说法相反，社会学家的调查发现，苏联社会明显地趋向于等级分化，它表现在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公平。

社会学家访问了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听取了他们个人对两种前途的选择。高中毕业后随即参加工作，还是继续读大学为自己谋取较有吸引力的职业。在新西伯利亚城经过连续四年（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广泛调查的一份典型调查报告，很能说明问题。这份报告是作为国际社会学大会的会议文件而散发的。表一（见第十三页）综合指出：被调查青年中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工农子女要求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能够如愿以偿的还不到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阶层子女希望进入大专院校，三分之二以上都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一九六五年根据新西伯利亚被调查青年的家庭社会职业类别划分的一份早期调查，其间的差别就更明显了（见表二）。

表一 高中毕业生计划升学还是参加工作的实际情况调查

(按百分比计)

家庭出身	1963 年		1964 年		1965 年		1966 年		四 年 平均数
	工作	升学	工作	升学	工作	升学	工作	升学	
集体农庄庄员									
希望	13	76	13	77	11	79	11	70	75.5
实际	55	44	52	48	45	46	43	51	47.3
工人									
希望	10	74	8	79	6	78	11	67	75.0
实际	49	47	47	49	45	49	44	45	45.0
未受高等教育的白 领阶层									
希望	9	75	6	81	7	81	6	80	79.0
实际	42	50	45	52	40	53	36	55	52.5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 识分子阶 层									
希望	2	95	3	92	3	89	5	85	92.5
实际	24	74	25	72	24	68	32	62	69.0

资料来源：Г. М. 科切特捷夫：《青年人的就业打算及其实现情况》。它是为一九七〇年于保加利亚瓦尔纳召开的第七届国际社会学大会而准备的文件。

正如表中所示，农民家庭子女和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子女，在实现接受高等教育愿望的比数是一比八（见第二栏），而两者的志愿要求升学的比数是七十六比九十三（见第一栏）。

实际上，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比附表所反映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是因为表上所统计的“高中毕业生”中包括了读完中等学校和中途退学的人。真正读完普通中学（不是职业学校）学制的农民家庭子女的百分比，要显著低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子女的百分比。如果我们假定这两者之间的比数是一比二或

表二 按家庭社会职业分类的高中毕业生个人打算及其实现情况
(按百分比计)

家庭出身	要 升 学	实 现 志 愿	要 求 工 作	实 现 志 愿	半 工 半 读	不 上 学	实 现 志 愿
城市知识分子阶层	93	82	2	15	5	3	
工业和建筑业	83	61	11	36	6	3	
服务性行业	76	59	9	38	15	3	
城镇知识分子阶层	76	58	11	42	13		
交通运输业	82	45		55	18		
农 业	76	10	10	90	14		
其 他	50	25	12	63	38	12	

资料来源：B·M·希巴金：《青年人进入生活》，一九六五年第五期《哲学问题》（莫斯科 第六一到六二页）。

者是一比三，那末，这两种家庭出身子女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数，就将成为一比十六或一比二十四而不是表二所示的一比八了。

此外，还可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了解。在乌法和奥伦堡两个城镇，调查了三个主要社会集团家庭出身子女在校就学时间的情况表明，农民家庭子女的在校就学的平均时间为七点三一年，工人阶级家庭子女平均为七点六六年，而知识分子阶层（笼统地说包括所有非体力劳动者）子女平均为十二点二二年。^①这意味着前两种青年甚至没有完成八年制的义务教育，而第三种青年却接受了两年多的高等教育（它超过了十年制的完全中等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在准备进大学的普通中学高年级学生中，工人阶级家庭子女的比重不断在下降，而知识分子阶层子女则在

① P·古罗瓦：《合伙——并且永远》，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文学报》。

不断上升。相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训练技工职业学校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百分之七十一.5的学生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只有百分之十一.5的学生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家庭。^①

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即使一个人已达到了进入大学的水平，但能不能进大学决定于他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一九六七年夏季，调查列宁格勒大学三个最有名气的系科的注册学生表明，百分之六十.6是专家们的后代。这些专家在苏联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但他们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②这就清楚地表明，出身于受过教育的、富裕的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多受教育的机会。

异 化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异化主要是在人们受到痛苦，又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情况下才会发生，并且它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消失。苏联虽然还没有宣布它已进入共产主义幸福时代，但它仍坚持这种虚构，认为通过国家所有制，已将生产资料归属工人群众所有，因而异化不可能存在于苏联社会之中。苏联社会学家在谈到苏联劳动群众态度时，使用“异化”这个词总是非常小心谨慎。然而，他们的调查指出，在苏联劳动人民中存在的异化状况已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了。

在工人中，存在着大量不满现状的情况。这可从一九六六年在列宁格勒的调查中看出：

M. 亚诺威奇和 H. 道奇：《社会阶级和教育 苏联调查的结果和反应》，一九六八年十月号《比较教育评论》第二五五页。

② T. A. 茹拉夫列娃和 S. B. 西卡维奇：《准备申请进入大学的社会状况》，一九七〇年第七期《人和社会》（列宁格勒）第五十六到五十九页。

表三 按年龄分组看职业是否满意的状况调查(%)

满 意 于	三十岁以下的	三十岁以上的
整 个 职 业	51.1	60.0
工 资 待 遇	34.0	46.3
对分配的工作内容	58.2	59.0

资料来源：A·G·兹德拉伏姆斯洛天等主编：《人及其工作》，纽约国际义化和科学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第一三二页。

正如表三指出，三十岁以下这一组中对工资现状不满的较多，只有微弱半数以上的人对他们的整个工作表示满意。但是，在三十岁以上这一组中，只有百分之四十是不满意的。参加上述列宁格勒调查工作之一的 B·雅多夫在他后来写的论文中说道：经过细致分析，在三十岁以下这一组中，只有百分之十六点七的人对工作完全满意，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倾向于满意，其余的人则模棱两可或者犹豫不决。①

对车间工长和中层管理人员所作的相同调查表明，不满情绪是跟工作人员的等级高低成反比例：

表四 管理人员对职业情况是否满意统计表(%)

职 务	满意	不完全满意	不满意	二三两栏小计	不置可否
高级工长	61.9	23.3	14.1	37.4	0.7
总工长	63.9	17.4	16.1	33.5	2.6
车间和部门负责人	70.6	19.5	9.9	29.4	—
车间其他技术管理人员	74.2	12.8	11.4	24.2	1.6
厂部科室行政负责人	78.2	16.8	2.9	19.7	2.1
厂部其他技术管理人员	84.0	8.0	8.0	16.0	—

资料来源：Ю·Ф·布哈诺夫和 Э·А·雅康巴编：《生产管理中舆论的作用》哈尔科夫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第八十二页。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消息报》第三版 转引自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当前苏维埃报刊文摘》第十五到十六页。

存在于工人群众中的不满情绪，也可间接地从相当高的流动率和违反劳动纪律中得到证明。

尽管也出现了相当可观的深入调查并涉及到工人不满情绪原因的主题，然而，很少发表有关这方面的调查结果，只有在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或者在报刊中偶而有所透露。看来，不仅是工人无力实现他们的物质愿望，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例如，在前面已谈到的关于列宁格勒青年工人的看法的调查报告中，作者们虽然指出青工爱好变换工作的特点，而结论却认为劳动还没有成为许多青工的个人需要。^① 其他作者也承认，尽管现制度千方百计使苏联的普通工人认识到自己是生产资料真正的“共同所有者（主人）”但他们对自己的工厂和整个国民经济还是缺乏“共同所有权”的真实感。这种情况甚至在每天报纸中也有所反映，在报刊上偶而有些社论和文章都强调，每个苏联工人都需要培养“所有权的感情”。^②

不管怎样兜圈子，总之，这已接近于公开承认异化确实存在于苏联工人之中，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有些苏联经济方面的作者指出，这只是部分由于最近企业全体人员被指责为对“真正的自我管理”的反抗，工人参加管理的各种形式仍然停留在“只限于顾问的”性质。^③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出现了各种各样“民主化”管理企业的建议，例如厂长应由群众民主选举而不应再由上级

A·G·兹德拉伏姆斯洛夫等主编：《人及其工作》，纽约国际文化和科学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第十三页。

例如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真理报》社论：《所有权的一种意义》；A·基里科夫：《每人都是工厂的主人》，一九六九年八月二日《真理报》。

③ 例如 T·B·拉基塔斯卡：《企业经营范围的形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第一八三到一八八页；B·B·拉普特夫：《科学管理上的法律问题》莫斯科法律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八十九页；以及 B·M·别德连科：《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的基本原则》，莫斯科思想出版社第一六二到一六五页。